

七、布达佩斯

因为不能够在巴布尔那弄到交通工具，我们又得回基安尔去，跟工人委员会的两个委员同路。途中我们经过了两个检查站，是由自由战士们把守着的。在基安尔我又渡过了一夜，演员们的殷勤好客和同志般的友爱，使那一个黄昏永铭于我的心中。他们正计划到各个医院去访问，给轻伤的战士们演出，他们又热情洋溢地谈论着要建立一座有生气的戏院的长期计划——它将在真正社会主义的匈牙利发展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遇见了三个奥国记者，他们的车子里有一个空位。我终于开始了走向布达佩斯的最后一段的旅程。全程80英里，车子行了三个多钟头，因为我们在检查地点停了好多次。在乡村中经常遇上出殡的、令人伤心的行列，我们却没有看见苏联军队。叫我们停车的那些匈牙利巡逻兵们告诉了我们开心的消息，说在首都，俄国人与匈牙利人之间的战斗业已停止，苏军的撤退已经开始。这是星期三，10月31日。那天午后，英姆雷·纳基对国会大厦前面的示威群众说：“我的朋友们，革命已经胜利了。我们驱逐了拉可西——吉遛这一帮。我们的内政将不容外人干涉。”那一天，在监狱与集中营里被关了六年的安娜·凯斯莱做了新近恢复的社会民主党的主席。那一天，强诺斯·卡达尔宣布一个新共产党的诞生，即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，据说，凡负有过去罪恶责任的人，都不容存在于其队伍中了。那一天，几十个的秘密警察被倒悬在布达佩斯树上和电灯杆上，群众向他们吐口水，有些人因为被多年的苦难与仇恨弄得狂暴了的，竟用香烟头去烧那死人的皮肉。

那一天，英国炸弹投掷在埃及领土上，并炸沉了苏彝士运河中一艘埃及的巡洋舰。艾森豪威尔总统称这攻击为一种“错误”。这是在苏军侵略匈牙利以前四天。

这时候，匈牙利的实权是分成两半的，一面是纳基政府，它获得人民支持，因为它反映他们的意志；另一面是那些武装人民自己，由他们的国民委员会代表着与领导着。这是一种两重政权。从匈牙利西部，东部，东南部与南部来的国民委员会的代表们会议于基安尔，他们提出了人民的要求：立即撤退苏军的增援部队——这些部队据说已经达到匈牙利东部；年底全部撤军；实行自由选举。有些报导说，基安尔已经成立了临时政府，不过这似乎是恶意指造出来的传闻，因为国民委员会要求有代表参加纳基政府。无论如何，谁掌握了布达佩斯政权这一问题是不容置疑的。掌握了武装的人民便是掌握了政权。

那么谁掌握了武装呢？是法西斯派吗？不，那是这些从事了战斗的人，那些自由战士们。他们是斯柴贝尔与乌奇佩斯的工人，是学生，那些十多岁的男女孩子们。他们的肩膀上挂了弹药带，腰带上插了手榴弹，手里拿着冲锋枪——被他们戏称为“吉他”的，是那些将自由的蓝白红三色旗替换了奴役的五星的士兵们。他们业已赢得了一场光荣的战斗，在一个时期内（多么短得可怕的一个时期呀！）他们欢乐着，甚至当他们为死者哀伤，在上千个新坟上点燃蜡烛之时，都是快乐的。甚至孩子们（上百上千的孩子们）都参加了战斗，我曾经跟几个小女孩子说了话，她们将火油倾倒在苏军坦克经过的路上，并且点燃了它。我听人讲起一些14岁来大的孩子们，他们手拿燃烧着的火油瓶，奋不顾身地上了坦克，全身武装的一

群12岁的孩子，向我夸说他们在战斗中所曾起过的作用。一个武装了的城市，一个武装了的人民，他们站起来了，用伟大的力量来砸碎束缚的铁链。在那些英勇的城市：巴黎，彼得格勒，广州，马德里，华沙这个名单中，如今又添了一个不朽的名字：布达佩斯！它的建筑可以被轰坏、烧焦，它的电车、巴士和电话线可以被破坏，它的行人道上虽然散满了玻璃并染遍了鲜血，但它那儿公民的精神却是不能被压制的。

人家还在继续清除秘密警察。在市立公园那边，五一路四十五号，他们发见了秘密警察的无线电阻截部门的总机关，那里又发现了大量冲锋枪，来福枪，手枪，弹药，手榴弹与各种衣服。人们用铲锹和钻具工作了一大阵之后，发见了一个以共产党总部为中心、延展在街道下面的地窖网。这些地窖是有两层楼高的，建筑时一定曾费了数月，也许数年的工夫。地窖的墙是混凝土的，六尺厚。它们有十分严密封闭的门，大量存贮食物和衣服，大量的军火与各式各样施酷刑的家伙。全城的人都知道地下深处正在开掘地道，从事开掘的人可能是秘密警察，也可能是犯人，或者由二者合作的。人们虽然知道这个地道的“迷魂阵”，可不能用烈性炸药来揭穿其秘密的。据我所知，当苏联军队于11月4日开始进攻时，那些被陷在里面的人仍然陷在那里……

从市区其他地方监狱出来的囚徒，一当他们从黑暗来到了光明中，便讲开了他们的故事。地下狱室时常是水深及踝的，他们终于从那里一瘸一拐一颠一蹶地走出来，走进了那些解救者的怀抱中。这是普希金预言在现时代的实现：

“沉重地系着的铁链终会脱落，

狱墙在呼号之前也会倾倒；

自由用光明来欢迎你了，

兄弟们还给你那把宝刀。”

许多的囚徒简直像是鬼魂出现：有些男人与女人，很久以来就被他们的亲友当作死去了的。这类人中有艾迪丝·蓬恩博士，这位以前代表《工人日报》驻在匈牙利首都的记者，我最后一次在布达佩斯遇见她是1949年9月间，那时她准备回英国去。我记得曾和她一起购物，还帮她挑选了一副象棋子。几天后她失踪了，正当她要去搭乘飞机之前。被控的罪名是间谍，在一个单人监房里被禁了14个月，带着紧紧的手铐，以致她的两腕间留着不会消失的创痕。后来给带上秘密法庭，被判15年徒刑，刑期却并不通知本人；因为她对法庭不敬，在单人监房里又关了六个月。等到革命放她出来时，她在监狱里又已渡过了五个半年头。

蓬恩博士以她体力上与精神上的坚强而自傲。另一些人就没有她那么坚强了。星期五夜间，我看见四百五十个囚徒，仍穿着睡衣式的条子囚衣裤，从布达佩斯的乔斯土福格监狱释放出来。其中有几个人疯了，得制止，加以较温和的看管。有四个囚徒是工程师，当他们建筑跨越多瑙河的斯大林桥时被以怠工罪名拘禁的。在一个狱室的黑而阴暗的墙上，一个囚徒刻下了一首诗，用拉丁字写了诗题：“拥护自由”。到星期五夜间为止，革命业已释放了五千五百名政治犯。

前后一共只有三天半的自由，布达佩斯的人民仿佛从骨髓里都感觉到这个间歇时间注定

了是短促的，所以他们热烈地从事民主的实施。生活是说不上愉快的。只有卖粮食的铺子开了门。公共交通停顿了，一直要到星期六，才有少数几辆巴士行驶，车子挤到了危险程度，人们攀悬在车身外面。载满青年人和兵士的大车以及插着红十字会旗帜的车子飞驰而过，可是街上其他的交通车辆就很少。电影院，戏院与餐室都关了门。没有人需要娱乐的刺激。在热烈沸腾的讨论和组织中好些政党发生了。前面我提起过社会民主党的再度出现，共产党的再生，以及改名为彼多斐党的国家农民党的活跃。小有产党又出面了。匈牙利基督教党组成了。此时又组成了新的工会联盟。他们的总部门前挂起了仓卒制成的横额。11年的冰块溶解了，民主不能控制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泛滥起来。

这一发酵现象之最显著的一面，对于一个新闻记者说来是最激动的一面，那就是突然地创刊了不下于25种的日报，它们代替了近年来那五种可悲的、无味的与刻板的报纸。过去布达佩斯有四种日报与一种晚报，可是工人们常常在它们上面